

国学新知文库

詹石窗 主编

《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研究

杨燕 著

東方出版社

《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研究

杨 燕 著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寒节

责任校对:湖 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研究/杨燕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8

(国学新知文库)

ISBN 978-7-5060-3920-8

I. ①朱… II. ①杨… III. ①朱熹(1130~1200)

-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24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06551号

《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研究

《ZHUZI YULEI》JINGXUE SIXIANG YANJIU

杨 燕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635毫米×927毫米 1/16 印张:24.75

字数:320千字 印数:1-2200册

ISBN 978-7-5060-3920-8 定价:64.00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总 序

“国学”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春官》：“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其中所谓“国学”实际上是指上古时期国家设立的学校。随着历史的进展，“国学”的内涵逐渐发生演变。到了近现代，“国学”成为指称我国特有学术的一个术语，其外延是以儒、道、释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涉及古代哲学、史学、文学、艺术、语言学、科学等诸多领域。本文库正是从广义上使用“国学”概念的，至于“新知”既意味着新的领域、新的视野，也意味着新的探索、新的认识。由于国学的范围相当广泛，这套文库当然应该有所选择，关注那些具有新发现、新观点的成果，这就是为什么将“国学”与“新知”合成的用意所在。从文稿选择的立场看，既然是“国学”，则入选的文稿必定是传统文化方面的；既然是“新知”，文稿如果仅仅反映传统文化内容，还是未能符合要求的，必须是两个方面的特质兼备，才能进入这套文库之中。也许组织者对文稿的选择不一定准确，但不论情况如何，“新知”乃是编纂这套文库的初衷，表达着一种愿望、一种追求、一种目标。

熟悉中国文化史的人们不会忘记，近现代的“国学”概念是为了与“西学”相区别而建立起来的。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轰开了古老中国的沉重大门。在列强的枪炮声中，西学伴随着传教士的脚步，悄悄地在中华大地上播衍。1894~1895年，甲午中日海战，历来以幅员广大、礼仪之邦自居的中国败给了地域狭小的以资本主义文明武装的东邻日本。这场战争震惊了中华民众，许多学人开始质疑传

统文化的经国效用，转而欣羨西方文明的强势。20世纪初，由一部分激进的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把矛头指向封建文化。在激烈的破“旧”热潮中，一些仁人志士忧心中国文化命脉的延续问题，遂倡导整理国故，发掘国粹，如1905年2月23日创刊的《国粹学报》、章太炎创办的“国学讲习会”等均体现了此等努力方向。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分别设立国学门和国学研究院，为国学热潮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22年1月，北京大学创建国学门，这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早以欧美研究机构为模式建立起来的研究所，也是在“整理国故”、“学术独立”的呼声中第一个以国学研究为主旨的学术根据地。其后，1925年9月，清华研究院国学门诞生。这两大国学专门研究机构，延聘王国维、陈垣、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等为导师，汇聚文史哲的诸多一流学者，培养了一大批国学人才，他们办会编刊，著书立说，以维护中华学统为己任。学术先辈们的丰硕成果和弘扬民族传统的执著精神展示了一种思想境界，也为当今我们组织编纂《国学新知文库》提供了精神资源与可以借鉴的经验。

如果说任何一种计划都有特定文化因缘的话，那么我必须承认厦门大学早期的国学研究传统乃是组织编纂《国学新知文库》的原初动力。早在1926年10月10日，厦门大学就创办了国学研究院。当时的校长林文庆自任院长，并且敦聘久负盛名的沈兼士先生任研究院主任，林语堂先生任研究院总秘书，张星烺先生、顾颉刚先生、鲁迅先生等名家任研究院教授。沈兼士等先生前来厦门大学之后，把国文系改称为国学系，拟以国学系作为国学研究院的依托，把国学教育与国学研究连接起来。当时国学研究院设置历史古物组、博物组（指动植矿物）、社会调查组（礼俗方言等）、医药组、天算组、地学组（地文地质）、美术组（建筑、雕刻、瓷陶漆器、音乐、图绘、塑像、纺织、书法）、哲学组、文学组、经济组、法政组、教育组、神教

组、闽南文化研究组；制定了详细的研究规划，包括研究生的招收与培养方案等；还筹办两种刊物，一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季刊》，一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后来季刊只编好创刊号，没有出版，周刊于1927年1月5日创刊，实际出版三期，发表文章十多篇；另外，也计划出版“国学研究院丛书”。可惜的是，由于校董陈嘉庚先生实业遭遇困难，经费紧缺，丛书出版计划最终没有付诸实施。回顾历史，我每每被厦门大学早期那些致力于国学研究的大师们的敬业精神所感动，但也为当时“国学研究院丛书”的出版计划未能实施感到遗憾。多年来，学术先辈们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一直激励着我，感召着我。于是，有一种愿望慢慢在我的心中孕育、成长，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继续学术先辈的未竟之业，并且把他们的国学研究传统发扬光大。我思索着，追寻着，等待时机的到来。

在经历了文化冬天的严寒考验之后，“国学”终于迎来了生机焕发的春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沉睡了数十年的“国学”研究重新被唤醒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神州大地的国学热潮逐渐复兴，传统文化研究机构相继诞生。依托着这些研究机构，有关国学的研讨会、刊物、专著、论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正是在新国学热潮逐步形成的文化大背景下，我在惜别16年之后重新回到母校厦门大学。1998年，我开始负责哲学系“中国哲学”方面的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教学工作。在教学之余，考虑最多的当然是怎样承袭和发扬沈兼士等前辈名家的国学研究传统，怎样进行学科建设的问题。从人力资源等方面来看，我们的学科建设尽管还存在着诸多困难，但可庆幸的是厦门大学领导给予有力支持，故而喜人的局面逐步形成。一方面，有关国学的研究机构，诸如道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佛学研究中心、闽学研究中心等相继成立或者恢复加强，师资队伍不断壮大；另一方面，有关国学研究的论著、丛书也陆续出版，例如《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研究》《易学与道教符号揭秘》《道教医学》《儒家文化

与中国古代科技》《道韵》丛刊十二辑、《中国科技思想研究文库》(系列丛书)、《哲学新视界》(系列丛书)等问世之后都得到了同行的好评。经过切实的努力,厦门大学的“中国哲学”专业于2003年获得博士授予权。2005年,厦门大学又获得哲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从而具有8个专业的博士点。与此同时,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的文学、史学、人类学、民族学、艺术学等各个学科也不断积蓄实力,全院到目前为止已拥有20多个博士点,朝气蓬勃的学科群体与浓厚的人文氛围为新一轮的国学研究提供了资源保证与精神支撑。

在兴趣、使命、学科建设需要的多重作用下,《国学新知文库》的编纂计划逐渐成形,并且见诸笔端。恰好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人民出版社(东方出版社)陈寒节先生的来信,他询问我关于近来研究计划的一些情况,我将《国学新知文库》的主要选题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他,经过几次电话联络和商讨,陈寒节先生告诉我可以将这套文库的出版计划提交出版社选题论证会讨论。不久之后,陈寒节先生通知我,人民出版社的选题论证会讨论通过了《国学新知文库》的编纂出版计划。欣喜之余,一种敬佩之情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我敬佩人民出版社领导的远见卓识,敬佩陈寒节先生的开阔眼界,感谢他的精心策划。

经过多方商讨与反复推敲之后,《国学新知文库》的编纂工作确立了如下宗旨:

第一,弘扬求实精神,鼓励学术创新。众所周知,任何一种学术研究,都必须具有求实精神,国学研究当然也不能例外。就过程而言,国学研究的求实精神首先意味着对从事的领域展开广泛的调查,精读相关的经典文献,详细占有资料,然后进行深入思考,避免信口开河、无中生有、有中说无,而是依据事实,客观陈述,立论稳妥。这种求实精神在节奏加快的当今学术圈中尤其需要。与此相联系,《国学新知文库》也特别强调学术创新。往昔的成就固然可以引为自

豪，但重复劳动是没有前途的。唯有学术创新，才能永葆国学的旺盛生命力，焕发学术研究的青春。所谓“创新”就国学领域来说，首先是文献史料的新发现、新发掘；其次也在于使用新的研究方法，从新的角度进行新的审视，提出新的选题，开展新的分析等等。古人称“天地日新”，又谓“革故鼎新”，此类格言成语说明我们的民族学术文化传统本来就非常提倡创新。在新的时代，尽管所谓“新”的标准不同，但先民们倡导创新的精神却依然没有过时，值得我们在国学研究工作中认真思考和发挥。

第二，扩展文化视野，兼蓄古今中外。从研究资料来说，我们不仅要熟悉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田野信息、考古资讯以及国内前贤时仁的论著，还要有世界眼光，努力掌握国外同行的学术动态，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海外对中华文化的研究越来越重视，成果也越来越丰硕。在文化学术传播越来越快的信息社会中，如果我们不能及时了解他国学者的学术新成就，就可能步他人之后尘，重复无谓的劳动，甚至陷入迷乱状态，徘徊不前；唯有高瞻远瞩，放眼全球，关注他国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就，并且认真加以分析和借鉴，才能扬长避短，超越学术瓶颈，取得新的突破。

第三，关注薄弱环节，培植研究特色。经过长期的努力，国学研究在总体上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却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以往许多人谈国学，常常把它局限在儒家文化圈内。其实，此等视野是相对狭窄的。由于认识的局限和导向问题，国学研究未能在比较广阔的领域展开，故而限制了它的发展前景。有鉴于此，我们组织编纂《国学新知文库》不仅要继续关注儒家学说和中国化了的佛教文化，而且将加强对国学中的一些薄弱环节的探究，比如道家、道教之学、古代科技哲理、传统经学与艺术的关系等等，这些领域都是以往的国学研究相对比较忽略的，现在我们应该对这些领域的研究多加鼓励。从发展的立场来看，“强势”与“薄弱”本是相对而

言的。当人们对于某个领域、某种专题不太关注而没有投入足够力量加以研究的时候，该领域或专题就是一种“薄弱环节”，而当人们对这种“薄弱环节”有了足够重视的时候，“薄弱环节”就可能转化为“强势环节”。但愿我们的努力不仅可以化“薄弱环节”为“强势环节”，而且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培植新的特色。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就精神领域而言，大多数人却依然主张文化多元化，因为一个民族只有保存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才能傲然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民，一方人民弘传一方文化”，既说明世界范围的文化本来就是多彩多姿的，也意味着文化“个性”乃是民族存在的基本标志之一。中华传统文明在历史长河中曾雄踞世界东方，其中蕴涵的精神宝藏，特别是人文资源，可以为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可是，晚清西学东渐以来，我国学术界主流倾斜于吸纳西洋、东洋文明，以追随西方的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为时髦，热衷于做西学的诠释者和传播者，却逐渐远离了对中华文化传统的认同。我们认为，富有情操的中国知识分子既要有宽广的胸襟和视野，敢于借鉴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同时也应该坦然地开启心扉，理直气壮地为发掘国学的积极资源而大胆探索，奉献力量。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已经登上国际文化舞台，正在与西方学术进行平等对话，而且成为我国腾飞的强大精神载体，从而被西方世界所关注。美国科学史专家萨顿（George Sarton）说：“正如东方需要西方一样，今日的西方仍然需要东方。……不要忘记东西方之间曾经有过协调；不要忘记我们的灵感多次来自东方。为什么这不会再次发生？伟大的思想很可能有机会悄悄地从东方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必须伸开两臂欢迎它。对于东方科学采取粗暴态度的人，对于西方文明言过其实的人，大概不是科学家。……新的鼓舞可能仍然，而且确确实实仍然来自东方，如果我们觉察

到这一点，我们会聪明一些。”^① 萨顿的论述无疑是深刻的，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来说也是富有启迪的。

胡适曾经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说过：“我们深信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这是因为国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因应了时代的需要，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向前迈进。我们希望《国学新知文库》也能切近时代脉搏，在新一轮国学春潮到来并且逐步高涨的时候推波助澜。

詹石窗

谨识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

2006年10月10日

^① [美] 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文明史论集》，刘珺珺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40—141页。

序

杨燕的《〈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研究》即将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她要我为该书写篇序，我作为她在硕士、博士阶段的导师，乐于为之。

杨燕是2004年考入厦门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研究生的。由于各种条件符合厦门大学的规定，她被选为硕、博连读对象。这意味着她不必再考试就可以直接从硕士阶段升到博士阶段。对于她来说，这个机会难得。不过，这也是一种挑战，既是对个人心理的挑战，也是对身体素质的挑战，因为硕博连读意味着要比其他同学少一年时间从事学习研究，所以必须更加勤奋努力。在写作方面，硕博连读的学生不必作硕士学位论文，直接就进入博士论文写作。从一般人的眼光来看，这当然省事、快捷；然而，其间所承担的压力其实更大。所以，最初我担忧她是否能够承受得住巨大压力，完成预定的培养计划。但从《〈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研究》的最后完成情况看，她不仅把压力化解了，而且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效果。

杨燕以《〈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研究》为题作博士论文，这对于她来讲着实不容易。虽然《朱子语类》只是朱熹的言论记录，但涉及领域相当广泛，其中不仅包括了朱熹对儒家传统经学的述评，而且包括了朱熹对佛教、道教以及唐宋以前文人雅士的学术见解等，头绪相当复杂，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厘清，其困难是很大的。可喜的是，杨

燕没有被纷繁复杂的头绪所吓倒，她以女生独有的细致、耐心和悟性，以举重若轻的悠闲心态和锲而不舍的持续探索，逐步地打开《朱子语类》的诸多文化纽结。

记得有一回，我询问她阅读文献的进度，她拿出一个记录得密密麻麻的本子给我看，原来是她追寻朱熹门人在各卷记录者中的分布情况。初看起来，这项工作对于解读《朱子语类》中的经学思想似乎有点多余，但再仔细想想，就觉得这是相当基础的稽考工作。事实上，有许多初期的琐碎工作是不会反映在成果行文中的，但没有这样的初期工作，纵深研究也就谈不上了。由于注重基础考察，杨燕能够比较深入地探究《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的来龙去脉，梳理出一个比较适合表达的逻辑框架。

杨燕《〈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研究》的价值首先在于开启了重新认识《朱子语类》学术价值的古老门扉。基于比较扎实的文献史料，杨燕将《朱子语类》富有个性的论述与儒家传统经学脉络联通起来，展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空间，这是具有开拓意义的。就中国哲学的整体认知而言，杨燕《〈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研究》也具有独辟蹊径的价值。回顾近50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以往的不少论著以西方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伦理观等为架构模式，在具体分析典籍、人物时习惯于“二分法”的戴帽式解析，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体系以及理论方法与许多学者的解读可谓渐渐远离。与这样的路数形成对比，杨燕《〈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研究》是由背景到主题，由宏观到微观的向度，从文献基础、经典构建、概念发微、整体意蕴及历史影响等五个方面分析了《朱子语类》的经学思想。由于方法路径不同，该书也就让人耳目一新。

还在14年前，我在撰写《论朱熹易学与道家文化之关系》的时候，曾经查考了《朱子语类》，并且利用了其中许多史料。在当时的背景下，我只是希望从一个侧面说明朱熹在《周易》研究方面的成

就与特色，但在查考过程中却发现《朱子语类》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有一段时间，曾经对这部书相当着迷，并且萌发了有朝一日对该书的经学思想进行一番梳理的想法。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朱熹进士及第后的第一任官是福建同安的主簿，而同安就是我的出生地，从小耳濡目染，感性的认识和老辈人的口口相传，让我对朱熹的历史文化特别关注。在我负责厦门大学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时候，就希望能够在朱子学研究方面有所建树，但由于多年来承担的各种课题较多，分身乏术，没有时间再对《朱子语类》进行更多探讨。杨燕的《〈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研究》可以说实现了我多年来的一个心愿。因此，当此书即将出版时也就特别高兴。

作为中国哲学界的一位新秀，杨燕的《〈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研究》算是她在朱子学研究领域的处女作，当然不可能十全十美，其中有些问题的探讨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殷切期望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是为序。

詹石窗

谨识于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

2010年6月14日

目 录

总 序	詹石窗 1
序	1
导论	1
一、相关重要概念及其关系辨析	1
二、《朱子语类》版本源流及其与朱熹经学思想的关系	7
三、《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研究的学术回顾	13
四、本书的基本思路与研究原则、研究方法	20
第一章 《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的文献基础	24
第一节 对《五经》及相关文献的讨论	24
一、关于《五经》本文	24
二、朱熹《五经》类自著	50
三、讨论《五经》时涉及的他人著述	56
第二节 对《四书》及相关文献的引说	69
一、关于《四书》文本	69
二、朱熹《四书》类自著	78
三、讨论《四书》时涉及的他人著述	80
第三节 《朱子语类》所涉及的其他主要文献	85
一、《朱子语类》所涉及的儒家类其他文献	85
二、《朱子语类》所涉及的佛道主要著述	93

第二章 《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的典籍重构	108
第一节 新典籍体系的选择与重构	108
一、推尊《四书》	108
二、《近思录》与新典籍体系	114
三、《小学》与新典籍体系	121
四、经学新典籍体系对传统典籍体系的扬弃	125
第二节 新典籍体系构建之因由	129
一、大胆活泼的学风蕴养了新典籍体系产生的可能性	129
二、挽救学术流弊对新典籍体系构建的影响	133
三、朱熹道统思想对新经典体系构建的决定性作用	138
第三节 新典籍体系构建之影响	152
一、“四书学”概况	152
二、对《近思录》的研究和模仿	157
三、《小学》书的编订与女性教育	161
第三章 《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的阐释理论	168
第一节 《朱子语类》阐释理论的基本精神	169
一、传统经学典籍阐释的基本精神	170
二、《朱子语类》对“圣人本意”的追寻	173
三、“圣人观”与本意预设	176
第二节 《朱子语类》阐释理论的实现路由	186
一、心理阐释	187
二、语法阐释	195
三、实践阐释	206
第三节 《朱子语类》阐释理论的现实困境	214
一、阐释基本精神的实际虚化	214
二、穷理与穷经的两难	220
三、阐释成果权威化的困扰	226

第四章 《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的概念发微	232
第一节 天理人欲	232
一、“天理”与“理”	235
二、“天理人欲”的内涵	244
三、对“存天理灭人欲”说批判之剖析	250
第二节 止	257
一、“止”的传统内涵	257
二、《朱子语类》对“止”的阐释	263
三、“知止”、“得止”	269
第三节 仁	276
一、对“以觉说仁”思潮的批判	277
二、对“以爱说仁”的学脉梳理	283
三、“以爱说仁”对孔孟儒学的精神回归	289
第五章 《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的宗教意蕴	295
第一节 《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的宗教背景	298
一、儒家经学自身的宗教传统	298
二、朱熹成长的社会宗教氛围	303
三、朱熹个人的宗教情怀	309
第二节 《朱子语类》经学修养论的祭祀根源	319
一、“观”在《朱子语类》中的内涵所指	319
二、“观”与《观》卦	326
三、《语类》对《观》卦的哲学升华与宗教意蕴保留	330
第三节 《朱子语类》天命观的宗教内涵	338
一、《朱子语类》中“天命”所指	338
二、《朱子语类》“天命观”中“理”、“气”的宗教意味	344
三、《朱子语类》天命观宗教色彩的特殊性	348
余论 《朱子语类》经学思想对当代儒学发展的启示	352

参考文献	363
后 记	375